

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演化模式及其反映的地区整合与开发策略

单思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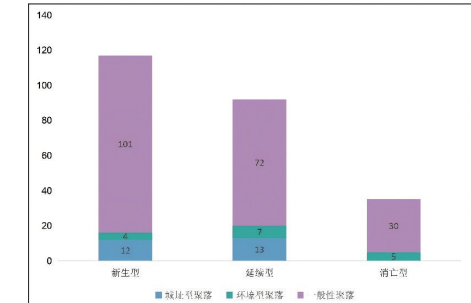
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既是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区域文明化进程的关键环节。据统计,目前发现并进行过考古工作的屈家岭文化聚落有200余处,广泛分布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峡江地区、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东地区,向南延伸至沅江中上游,向北扩展至丹江上游、淮河上游。本文拟考察自屈家岭文化前一阶段至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聚落的历时性演化模式,初步探讨屈家岭文化在统一长江中游地区过程中的整合与开发策略。

依据聚落形态与结构特征,可将屈家岭文化聚落分为城址型聚落、环壕型聚落和一般性聚落三类。又根据聚落不同存续状况分为消亡型聚落、延续型聚落和新生型聚落三种,消亡型指存在于屈家岭文化前一阶段且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废弃的聚落;延续型指存在于屈家岭文化前一阶段且继续使用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新生型指屈家岭文化时期新建的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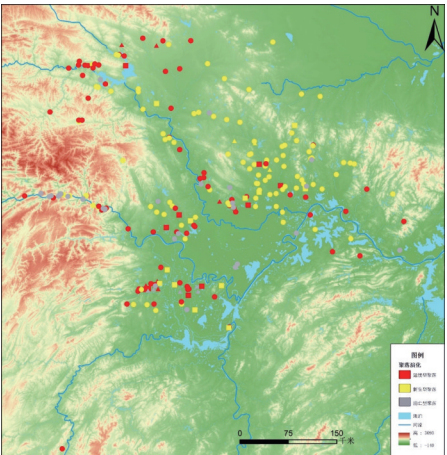
统计显示,至屈家岭文化时期,消亡型聚落35处,延续型聚落92处,新生型聚落117处(图一)。从聚落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数量和密度远超以往阶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量增长。有学者推论长江中游地区在屈家岭文化之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为每百年12.80%,进入屈家岭文化时期达到每百年23.33%,至人口增长高峰(郭凡:《聚落规模与人口增长趋势推测—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的相对人口数量的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从聚落结构演化情况来看,消亡型多为一般性聚落,少量环壕型聚落;延续性以一般性聚落为主,其次为城址型聚落,少量环壕型聚落;新生型聚落也以一般性聚落为主,其次为城址型聚落,少量环壕型聚落。一般性聚落作为屈家岭文化聚落的基础,既有较多早期聚落的废弃,又有大量的新建。城址型聚落数量增幅显著,新生与延续数量大体相当,未见消亡现象,表明城址作为高等级聚落一旦建成便长期沿用。环壕型聚落数量始终较少,新生、延续与消亡数量相近,在聚落体系中居于补充地位。这种变化反映出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结构的复杂化趋势,随着人口增长与聚落扩张,除了大量营建一般性聚落安置主要人口外,高等级聚落优先采用结构更完善、功能更复杂的城址形态,环壕聚落则因防御与组织能力相对有限,未成为主流选择,体现出筑城技术普及与社会管理能力提升背景下聚落形态的优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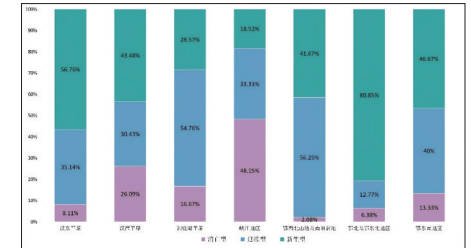
为进一步考察不同存续类型聚落的空间格局,制作区域聚落存续类型空间分布图(图二)。据图,可见消亡型、延续型、新生型三类聚落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消亡型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平原、汉西平原至峡江地区,延续型聚落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和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新生型聚落的主要分布范围涵盖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北及鄂东北地区。结合不同区域聚落存续类型的数量和占比制作柱状图(图三)。据统计分析,可将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演化格局具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少量早期聚落消亡,有较多延续使用,同时有更多新生聚落,如汉东平原(消亡型8.11%、延续型35.14%、新生型56.76%)、鄂北及鄂东北地区(消亡型6.38%、延续型12.77%、新生型80.85%)、鄂东南地区(消亡型13.33%、延续型40%、新生型46.67%)。第二种情况为极少数早期聚落消亡,大部分延续使用,同时新生较多聚落,如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消亡型2.08%、延续型



图一 屈家岭文化聚落分类存续状况统计柱状图



图二 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存续类型演化空间分布图(注:方形为城址型聚落,三角形为环壕型聚落,圆形为一般性聚落)



图三 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存续类型占比柱状图

聚落的主要分布范围涵盖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北及鄂东北地区。结合不同区域聚落存续类型的数量和占比制作柱状图(图三)。据统计分析,可将屈家岭文化区域聚落演化格局具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少量早期聚落消亡,有较多延续使用,同时有更多新生聚落,如汉东平原(消亡型8.11%、延续型35.14%、新生型56.76%)、鄂北及鄂东北地区(消亡型6.38%、延续型12.77%、新生型80.85%)、鄂东南地区(消亡型13.33%、延续型40%、新生型46.67%)。第二种情况为极少数早期聚落消亡,大部分延续使用,同时新生较多聚落,如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消亡型2.08%、延续型

进素图诺尔遗址：早期红玉髓/玛瑙珠研究的新契机

艾婉乔

近年来,早期红玉髓/玛瑙珠的发现与研究逐渐升温。日前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红玉髓珠的溯源研究登上《美国科学院院刊》(Sourcing the origins of carnelian in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s, PNAS 2026 vol.123 No.7),继而被媒体广泛转载,大大提升了这类小小串珠的知名度。更令人振奋的是,近日《草原文物》刊载了内蒙古进素图诺尔遗址的考古调查简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进素图诺尔玛瑙加工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草原文物》2026年第2期,以下简称《简报》)。这一发现必将拓展我们对早期玛瑙/红玉髓珠制作和流传的认识,甚至为我们了解早期东西以及南北方向上的物质交流带来突破。

进素图诺尔遗址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地处通往古居延泽的古河道附近。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阿拉善盟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与额济纳旗文物保护区中心于2023年至2025年在当地调查采集到加工工具、玛瑙原料、珠坯、残珠、碎片、陶片、青铜器等各类标本500余件。我们看到,在这些发现中有不少处于不同磨损阶段的石钻头(即简报所谓“内研磨器”),十分难得。石钻头制成形,局部经修整,大体呈扁片状。未经使用的石钻前端大体为三角形,便于钻取,后端则较宽便于绑缚于钻杆上,这与国外手工业遗址出土的钻头类似(见图)。在使用过程中,钻头前端逐渐磨圆形成圆锥或柱状,切割能力也逐渐减弱,直至被废弃。受金属钻头和孔形影响,有人以为实心的石钻应是柱状。但这并不准确,受此误导很可能忽略遗址上出土的石钻具。进素图诺尔的发现则提供了极好的标本。同样,遗址上采集的“外研磨器”也为了解古人打磨串珠的方法提供了重要依据。事实上,进素图诺尔的遗址涉及从玛瑙珠选料到加工制作的全部流程。类似的制珠作坊遗址罕见。它为探讨戈壁地区制作玛瑙珠的原料、技术、成品特点、制造规模 and 方式提供了丰富信息。

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玛瑙珠(agate beads)与红玉髓珠(carnelian beads)通常并提,指由桔红至深红色的玉髓类矿物制成的串珠。此类矿物一般都有玛瑙环纹,其中环纹不明显的又称“红玉髓”。此类串珠见于南亚、两河流域、古埃及等地青铜时代墓葬中,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注意,被视为探讨远程交流的重要线索。尤其在南亚,除了成品珠,在哈拉帕、昌胡达罗等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的城市遗存当中都发现了红玉髓珠作坊遗迹,而且直至近代仍有人采用传统方法制作这些珠子。得益于丰富的手工业遗存和民族学材料,考古学者对南亚红玉髓珠的生产过程和技术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认识颇为深入(J.M. Kenoyer, Ancient Cities of the Indus Civilization,Oxford 1998)。而对于其他地区发现的红玉

髓/玛瑙珠,学者们在考察其外观和技术特点后,讨论的往往是其与南亚的关联。这不仅是因为南亚红玉髓珠制作传统悠久,还与其他地区同类串珠的生产遗迹较少,研究不充分,无法开展对比研究有关。红玉髓/玛瑙珠在公元前2千至1千纪已广泛见于中亚、东亚、东南亚、南欧等地。如果说所有的珠子均来自南亚,恐怕未必令人信服。

最明显的是中蒙边境附近戈壁地区的发现。最近15年,随着河西走廊地区几部发掘和调查报告的出版,学者注意到,河西走廊地区不仅于公元前2千纪初先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红玉髓/玛瑙珠,而且在酒泉干骨崖墓地,阿拉善盟Ukh-tokhoi洞穴、永昌下安门、民勤火石滩等地还存在零星的红玉髓/玛瑙珠制作相关遗物。这说明戈壁地区人群也在制作红玉髓/玛瑙珠,但具体的技术特点和制作规模不清楚(艾婉乔等《从河西走廊西部的新证据看甘青地区红玉髓/玛瑙珠的出现》《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西南西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进素图诺尔遗址的发现则使开展相关研究成为可能。

从简报报道来看,进素图诺尔遗址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是多方面的。首先,遗址内丰富的原料、半成品和工具为研究当地红玉髓/玛瑙珠的制作工艺、流程、生产规模提供了丰富材料。

其二,通过进素图诺尔遗址了解戈壁地区制作串珠的外观特点。简报认为进素图诺尔遗址年代约当青铜时代即公元前2千纪早中期的四坝文化阶段。同期戈壁地区发现的玛瑙/红玉髓珠主要来自河西走廊西部火烧沟、干骨崖和鹰窝树墓地。其中,火烧沟与干骨崖墓地两地的珠子面貌差别较大:火烧沟串珠绝大多数为橙红色的“红玉髓”,片皆对钻、珠身打磨光滑,做工总体比较细致。而干骨崖的材料外观差别较大,常采用单面钻、表面打磨不充分。因此火烧沟红玉髓珠被认为是成熟作坊的产品,可能来自远程交流;而干骨崖的红玉髓/玛瑙珠则是当地小规模制作的产品。将进素图诺尔的发现与上述串珠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进素图诺尔珠坯和残珠尺寸与河西四坝文化墓葬出土的珠子尺寸范围相近,但火烧沟与干骨崖有一部分珠子更小,直径不足7毫米。这可能与进素图诺尔串珠尚未完成打磨有关。另外,干骨崖的串珠与进素图诺尔珠坯和残珠在外观和制作上存在一些相似之处,采用的都应是戈壁上的玛瑙料,与南亚那些开采后经人工缓慢加热而获得的红玉髓原料相比,颜色和外观都更加多样,同时流行单面钻。

其三,关注当地作坊采用的穿孔工艺。这是

56.25%、新生型41.67%)。第三种情况为有一定数量早期聚落消亡,较多延续使用,同时新生较多聚落,如汉西平原(消亡型26.09%、延续型30.43%、新生型43.48%)、洞庭湖平原(消亡型16.67%、延续型54.76%、新生型28.57%)。第四种情况为大量早期聚落消亡,部分延续使用,新生少量聚落,如峡江地区(消亡型48.15%、延续型33.33%、新生型18.52%)。此外,淮河上游和沅江中上游数据过少,不作讨论。

上文所分析的数据差异可能反映了屈家岭文化对于不同文化谱系背景下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扩张和整合策略。笔者曾提出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以汉水和长江为界,分为西南部的大溪文化系统、西北部的后冈一期文化系统和东部的屈家岭文化系统,最终以屈家岭文化的整合统一为发展高峰(刘礼堂、单思伟:《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格局及其演进之路》,《光明日报·理论版》2024年5月20日)。具体到本文,原属大溪文化系统的洞庭湖平原、汉西平原至峡江地区,消亡型聚落最多,表明屈家岭文化系统向西南扩张过程中区域冲突较突出,可能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手段,导致较多早期聚落废弃,原属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的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鄂北及鄂东北大部分地区,消亡型聚落极少或较少,大部分聚落延续使用,说明屈家岭文化系统向北扩张过程较为柔和,可能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整合,形成了南北迥异的聚落迭代与区域整合路径。鄂东南地区的情况较为类似,部分地区曾属于薛家岗文化分布范围,应该也是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完成整合。

屈家岭文化对不同区域的开发力度和经营策略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汉东平原、鄂北及鄂东北地区、鄂东南地区的新生型聚落占比均显著偏高。汉东平原本就是屈家岭文化系统的核心区域,依托原有基础持续发展,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得以进一步开发,是屈家岭文化重点经营区域。鄂北及鄂东北地区、鄂东南地区以往聚落相对稀少,开发程度一般,应该与其区域内有较大比例的山地有关,但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得到大力开拓,涌现出不少新聚落。鄂西北山地及南阳盆地早期聚落相对较多,大多得以延续使用,同时新增占比超40%的新生型聚落,区域发展连续性强,在原有聚落格局下持续规模性扩容。西南部的洞庭湖平原则以延续型聚落为主,新生型聚落占比偏低,反映屈家岭文化对此地采取较为保守的开发策略,而峡江地区的聚落存续类型数据似乎表明屈家岭文化对其有一定程度的舍弃。

综上分析,屈家岭文化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扩张和整合策略,与其差异化的地区开发策略高度耦合,共同促进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整合统一和聚落体系的迭代重构,塑造出屈家岭文化内部层次分明、区域异质性显著的社会发展格局,进而推动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走向纵深。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近年来,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因首次 in 冀西北地区发现红山文化典型积石冢遗迹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为研究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丧葬祭祀习俗、社会文明化进程以及本区与辽西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影响等重要问题提供了新材料,对探索红山文化的流向有重要意义(龚湛清等,2025)。但因工作刚刚起步,以郑家沟遗址为代表的这批遗存,其考古学文化性质尚有争议(任瑞波和赵梦竹,2026)。冢群附近的山顶虽可采集到相关遗存,但因尚未进行发掘,目前无法证实其就是同时期人类的居址,因此营建冢群的先民们居于何处,仍是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根据既往研究成果,史前先民的居址选择往往受到区域地貌与水文环境的综合制约,本文将在初步野外考察及区域地质地貌资料的基础上,对郑家沟遗址及其周边的地势地貌、地层沉积特征等进行初步分析,以期为郑家沟遗址的后续研究提供环境背景支持,助其更好地理解本区先民的选址行为模式及人地关系网络。

宣化盆地的地质地貌

宣化盆地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过渡地带,属华北地台北缘蒙古山槽带,以及晋冀蒙盆地新构造区。区域基底为太古界及下元古界变质岩,上覆中上元古界海相沉积、侏罗系河湖—三角洲沉积及第四系松散沉积物等(谢玉玲等,1996)。盆地于第四纪早期形成,中晚期持续断陷,第四纪地层主要沿山前及山间沟谷分布(尤惠川等,2008;陈立泽和徐岳仁,2015)。宣化盆地受大马群山、黄羊山及军都山围限,构造上受宣化北逆冲断裂与盆地南部下花园逆冲断裂控制,属新生代断陷山间盆地。新构造期断裂复活,差异升降强烈,活动可能延续至全新世(宋津生和魏世英,1979;索艳慧等,2013;周江林等,2015;庄其天,2017)。

本区坐落于古近纪—新近纪以来发育的夷平面。由于盆地东北部山前地长期断块抬升,盆内差异化沉降,叠加洋河侵蚀与堆积作用,共同造就了宣化盆地的地貌格局(宋津生和魏世英,1979)。区域平均海拔约1100米,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貌自外围到盆地中心依次为低山丘陵、山麓倾斜平原和河谷平原。低山丘陵区沟谷纵横,季节性洪流侵蚀强烈;山麓倾斜平原区由山前洪积—冲积扇连结而成。沿柳川河、龙洋河等流出口连片发育复合洪积扇群,扇体由多期洪积物叠置而成。河谷平原由盆地中部的洋河冲积而形成,是盆地最低地貌单元,整体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微倾,地势平坦开阔,发育多级河流阶地。

盆地边缘的洪积扇台地及盆地中部的河谷平原区是本区最有可能被先民利用的地貌单元。盆地边缘广泛发育冲洪积扇,沿山前呈条带状分布,形成山麓倾斜平原。经构造抬升及河流下切改造形成扇面平缓、扇缘陡坎发育明显的洪积扇台地,受冀西北盆地间歇性新构造抬升,洋河支流及次级冲沟对洪积扇产生下切侵蚀改造,原始扇面相对抬升于现代河谷沟谷之上,形成扇面平缓、扇缘陡坎发育的形态,发育多级洪积台地地貌,后经现代农田改造扇缘形态不明显。本区山前冲洪积扇沉积物的主要物源为盆地周缘广泛出露的中生代土城子组紫红色碎屑岩(刘晓波等,2016;Scuderi et al., 2021)。碎屑物质经长时间风化剥蚀由季节性洪流搬运至沟口,形成连片洪积扇沉积,后经风成堆积上覆马兰黄土层。盆地中部为狭长带状河谷平原,地势平坦开阔,洋河自西北向东南流经盆地腹部,河槽宽浅,河漫滩宽广,并发育多级河流阶地。

通过对洋河及其支流龙洋河的考察,初步认识了本区的河网阶地情况。根据在洋河南岸西前所村附近区域的调查,洋河南岸发育有三级河流阶地,阶地沿河谷两岸带状展布,后缘与山前洪积台地平缓过渡。河漫滩海拔0.5~1米,仅在现代护坡范围内呈带状分布;T1阶地海拔3~5米,南北宽约600米;T2阶地海拔15~20米,剖面可见典型河阶地二元结构,阶地连续平整,为盆地内的主要农耕面;T3阶地海拔75~30米,西前所村即坐落于此。T3阶地随地势逐步抬升,与盆地西南缘郑家沟区域的洪积台地平缓衔接,西部距虎山积石冢即分布在台地后缘的山前孤丘上。从盆地中部到边缘呈现河流阶地到洪积台地再到山地丘陵的连续地貌形态。

郑家沟冢群所在台地的沉积特征

郑家沟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隅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约100米处的黄土台地上,海拔约1014米。经考古调查,在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7个地点,共计9座积石冢。目前已发掘的一号冢位于遗址东部黄土台地的顶部,残存平面呈梯形,剖面呈弧形,中、西部较高,北、东、南两侧较低。碳十四测年结果多在距今5300~4800年之间。郑家沟及其周边冢群均位于宣化盆地西南缘的山前黄土台地上,隶属阴山系熊耳山余脉延伸地带,区域整体为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山间丘陵地貌,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微倾,起伏较缓和,台地地形平坦开阔。

冢体下层的黑土堆积为内蒙古东部常见的黑钙土。黑钙土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地带性土壤,主要分布于东北北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向西延伸至燕山北麓和阴山山地(赵玉明等,2020)。黑钙土剖面的典型特征为表层腐殖质层深厚、下部发育钙积层,成土过程主要表

浅谈宣化郑家沟冢群及其周边遗址的沉积地貌特征

庞雯麒 温泽星 龚湛清 张俊娜

现为腐殖质累积与碳酸钙淋溶淀积。根据土质土色观察,冢体下部堆积自下而上可分为四层:底部为浅黄色粉砂,为区域风成黄土堆积,是上部土壤的成土母质;其上为松散纯净的白黄色粉砂层,钙含量较高,为土壤淋溶—淀积作用下形成的钙积层;之上为灰棕色与黄灰棕色相间分布的细粉砂,为过渡层;向上渐变为灰黑色、团粒结构发育的粉砂质黏土层,即腐殖质层(程礼花等,2025;海春兴和陈健飞,2017)。整体呈现为典型的黑钙土序列,可与区域地层进行对比。

郑家沟积石冢的主体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后,当时遗址所在的山前黄土台地上已发育有深厚的黑钙土,其为全新世暖湿气候背景下植被繁盛的土壤化产物。先民选取视野开阔的台地高处,就地取用山地基岩风化破碎岩块垒筑积石冢,并陆续在此处开展了长时间的埋葬与祭祀活动。其后长期的风积、坡积黄土覆盖了积石冢,坡面流水仅对台地边缘产生了侵蚀,而台地中部的文化堆积得以埋藏保存。

从目前对宣化盆地200余座积石冢的调查结果来看,绝大部分积石冢均分布在盆地周围山前黄土台地相对平坦的顶部台塬上,周围石料充足,视野开阔,说明本区冢群选址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先民在营建积石冢时对地貌位置、建筑材料、景观视野等的多重考量。

考古调查居址所在的地貌特征

宣化盆地田野考古调查目前发现的先民居址数量相对较少,仅10余处,主体时代大致为仰韶晚期至龙山时期。现以调查发现的两处居址为例,试析先民对其生活居址的地貌位置选择及其原因。

郑家沟东遗址位于郑家沟村东侧约450米的山前黄土台地上,海拔约950米,西南距郑家沟一号积石冢约1千米。地表可采集到素面夹砂灰褐陶、绳纹泥质灰陶、红黑彩相间的彩陶片,可辨器型有盆、钵、罐等;依据出土遗物初步推断,该遗址年代为仰韶时代晚期。遗址坐落于较郑家沟遗址更低的黄土台地上,北临开阔平缓的洋河河谷平原,南接起伏更大的低山丘陵。台地地势平缓高亢,整体北高南低,东侧为南北向冲沟,西侧紧邻郑家沟沟谷,可就近获取山间水源。

王千户遗址位于塔儿村乡王千户村北侧约600米处,海拔约940米,地表可采集到泥质红陶、夹砂灰褐陶、夹云母灰陶陶片,可辨器型有壶、罐、盆等。另采集到少量玉环、玉璧残段。初步判断该遗址处于仰韶时代晚期—龙山时代早期。遗址整体位于宣化盆地南缘低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地上。台地东侧分布多条树枝状沟谷、切割破碎;台地西侧边缘出现一组较低台地,其地貌单元与东部的丘陵黄土台地不同,较低台地被西侧山间沟谷切割,为三角状断面。剖面上可见细粒黄褐色洪积物多层砾石层交错互层,其中既包括分选与磨圆较好的水平砾石层,也包含分选磨圆较差的大砾石层块状透镜体。说明低台地是西侧山前洪积作用与南北向支沟冲洪积作用的共同产物,后被支沟切割形成小型洪积台地。台地面整体高出周边小型冲沟谷底,前缘受坡面流水侵蚀以及人工修筑路面形成微陡坎,台面开阔平缓,起伏程度低于西侧山地。由此可见,王千户先民选址既包括较高的丘陵黄土台地,也包括较低的洪积台地,也说明洪积台地在先民择居之前已为较稳定的地貌面。

总体来看,目前宣化盆地发现的少量居址均分布于地势较高的山前黄土台地或洪积台地上,而在中部平原区尚未发现,说明洋河水源并非先民选址的必要因素。虽然目前遗址所在台地附近的黄土冲沟大部分为旱沟,但宣化盆地一些类似的冲沟中也有泉水出露,尤其是雨水较多的季节或年份,因此,推测先民生活的全新世时期本区环境可能更加暖湿,沟谷中泉水溪流较多,或为先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

小结

宣化盆地主要的地貌面有低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地,山前洪积台地及中部河流阶地。区域黑钙土为先民活动提供了土壤基础。坡面流水侵蚀可能破坏台地面上的浅层文化堆积,对遗存埋藏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调查发现的一号冢与居址均位于盆地周围的山前地带,可能主要利用山间沟谷的泉水或溪水作为水源。从两者选址的景观差异来看,积石冢大多选址于地势较高且相对独立的丘状台地顶部,周围视野开阔,通过高地表达一定的精神象征意义,便于丧葬祭祀活动的开展;而居址则多位于与主脊连接、通达性和避风性较好的次一级黄土台地上,选址性主要基于实用性考虑,优先选取规模更大、连片延展、高亢避洪的台地便于先民开展生产生活活动。

我们仅依托野外宏观地貌、地层剖面进行了初步考察,还未系统开展环境考古工作。洋河流域阶地发育与河流地貌演变过程,郑家沟先民生活时期的气候、地貌水文和植被环境,红山人群迁移路径、动因与区域地貌—环境格局的关系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此外,目前宣化盆地调查发现的居址较少且具体时代仍未明确,与郑家沟遗址的相关性尚待讨论。因此,未来将开展与田野考古工作密切结合的环境考古研究,深入探索宣化盆地区域环境演化与史前文化发展的关系。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